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资本之城

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

布鲁斯·G. 卡拉瑟斯 (Bruce G. Carruthers)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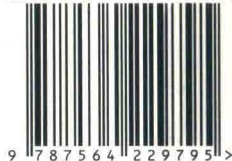
李栋颢 ◎译

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者大多认为，政治行为常常服务于经济利益，或者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然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本书作者布鲁斯·G.卡拉瑟斯就看到了政治与冲突对经济制度的影响，阐发了其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卡拉瑟斯将目光投向了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英格兰。这一时期见证了议会权力的扩张，以及议会中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两大最为重要的政党的形成。与此同时，一个有序集中的资本市场正在迅速崛起。书中详细考察了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与南海公司三大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股份公司成立与运营的党派背景，深入分析了股票市场上个人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旨在从组织与个体层面阐明政治力量如何塑造出一个竞争激烈、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书中所介绍的诸多历史事件，读来引人入胜，颇具启发意义。

网址：www.sufep.com

ISBN 978-7-5642-2979-5



9 787564 229795 >

定价：68.00元



微信公众号



天猫旗舰店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资本之城

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

布鲁斯·G. 卡拉瑟斯 著
(Bruce G. Carruthers)

李栋颀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之城: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美)布鲁斯·G. 卡拉瑟斯(Bruce G. Carruthers)著;李栋颺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5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City of Capital: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ISBN 978-7-5642-2979-5/F·2979

I. ①资…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金融改革-研究-英国
IV. ①F835.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7627 号

图字:09-2016-182 号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Bruce G. Carruthers

Copyright © 1996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2019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责任编辑 陈·佶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资 本 之 城

——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

布鲁斯·G. 卡拉瑟斯 著
(Bruce G. Carruthers)

李栋颺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7.25 印张(插页:2) 282 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68.00 元

总序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投资行业从不乏聪敏之人，但是增智开慧乃至明心见性才是成长为优秀投资人的不二法门，读书无疑是学习提升的最佳方式。

常有人说投资是终身职业，但我认为投资更需要终身学习。很多人投资入门多年，依然不得其道；终日逡巡于“牛拉车不动，是打车还是打牛”的困境，不得要领。从业多年，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投资人士，个中缘由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非常普遍：或是长期疏于学习，或是踏入“学而不思则罔”的陷阱。

我认为，学习大致有三个层次，亦是三重境界：

第一重是增加知识，拓展基础的能力圈。着眼点是扩大个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积累，这是大多数人的学习常态，这一重固然重要却不是学习的本质。

第二重是提高逻辑，改进个人的认知框架。达到这一境界，已经可以将刻板知识灵活运用，但仍然仅可解释过去却无法指向未来。

第三重是强化洞见，思考从个人出发，无视繁复的信息噪声干扰，穿透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开始正确地指导现实世界。在这一境界，学习已不只是追求知识，更是追求“知识的知识”。这是无数积累之后的茅塞顿开，更是质量互变之际的醍醐灌顶，不断思考感悟尤为重要。

书籍浩如烟海，书中智慧灿若繁星，而若能由自己抽丝剥茧得到“知识的知识”，将会终身受益。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名上海财经大学的普通学生，对投资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惜国内的投资业刚刚起步，相关资料远没有今天互联网时代

这样发达,此时财大的图书馆像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收藏着大量有关投资的英文原版书籍。我一头扎进了书丛,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经典,通过这一扇扇大门,我对西方资本市场发展窥斑见豹,其中提炼出的有关投资理念、流程、方法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了日后的我。时至今日,常有关心汇添富的朋友问起,为什么根植于国内市场的汇添富,投资原则和方法与外资机构如此类似?我想多少应该与我当年的这段经历有关。

今天,我依然非常感恩这段时光,也深深地明白:那些看过的书、走过的路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以人才为核心的基金投资行业。今年恰逢中国基金行业二十周年,二十年斗转星移,正是各路英杰风雨兼程、夙兴夜寐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汇添富基金是见证者,也有幸参与其中。这些年,我总试图在汇添富重现当年我学生时的氛围,鼓励同事们有空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在此,奉上“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以飨读者,希望大家能够如当年懵懂的我一般幸运: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可以不断提升进化自己。

是以为序。

张 晖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12 月

致 谢

社会学研究是一项集体事业,作者个人为此或受赞誉,或受指责。致谢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将毁誉之词传达给应得之人。随着这项研究的推进,审阅与校勘本书各章节的人数众多,在此难以一一尽录。那些读完整书的人想必是受苦不小,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向莎拉·巴布(Sarah Babb)、温迪·埃斯普兰德(Wendy Espeland)、卡罗尔·海默(Carol Heimer)、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卡尔·蒙斯马(Karl Monsma)、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皮特·西格尔曼(Peter Siegelman)、亚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与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悉心阅读与建设性意见。该项目的启动离不开博士论文委员会委员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希达·斯科克波(Thea Skocpol)与已故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给予的帮助。感谢约翰与希达的宝贵建议与不懈支持,他们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与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一直激励着我。感谢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与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及时与我沟通,帮助我厘清论证思路。不过,按照一贯的传统,对于本书中遗留下来的错误,我必须承担起责任。

感谢西北大学社会学系的前任与现任员工为我创造了一个舒适友善的环境,让我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感谢各位同事,尤其是希瑟·琼斯(Heather Jones)与卡门·克兰斯敦(Carmen Cranston)的关照,使我得以更好地兼顾学术研究与家庭生活。感谢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与波利·胡佛(Polly Hoover)两位古典派学者向我介绍了欧迈尼斯。此外,还要感谢亚当·格布勒(Adam Gebler)与凯特·威尔逊(Kate Wilson)的助研工作以及肯·道伯(Ken Dauber)的绘图技艺。能够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皮特·多尔蒂(Peter Dougherty)和比尔·拉兹诺夫斯基(Bill Laznovsky)共事,我感到非常荣幸。对于美国律师基金会[时任负责人为威廉·L. F. 菲尔斯提纳(William L. F. Felstiner)]与西北大学研究补助委员会为本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我深表感激。

在英国期间,我得到了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英格兰银行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社会法学研究中心、伦敦市政委员会档案馆、同业公会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公共档案馆与苏格兰皇家银行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P. G. M. 迪克森(P. G. M. Dickson)、伊夫林·克鲁克尚克斯(Evelyn Cruikshanks)与亨利·罗斯维尔(Henry Roseveare)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建议,可惜我并未能一一落实。

除其他许多优秀品德外,我的朋友们还帮助我保持清醒与乐享生活,这是研究得以完成的两大必要条件。在此,我要对皮特(Peter)与肖恩(Sean)、埃德温(Edwin)、利斯(Lis)、阿尔弗雷德(Alfred)、德金(Durkin)、英格里德(Ingrid)与鲍勃(Bob)、凯西(Kathy)与尼克(Nick)、苏妮塔(Sunita)、汤姆(Tom)与波利(Polly)、布莱尔(Blair)、特瑞(Terry)与霍利(Holly)、亚特(Art)与卡罗尔(Carol)、马克(Mark)、莫林(Maureen)、丹尼斯(Dennis)与苏珊(Susan)、鲍勃(Bob)与莉莎(Lisa)、泰西(Tessie)以及查尔斯(Charles)与玛丽(Mary)表示感谢。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要感谢埃尔斯佩思(Elspeth)与安德鲁(Andrew)、玛丽(Mary)与艾瑞卡(Erika)、安妮(Anne)与约翰(John)、斯科蒂(Scotty)、温迪(Wendy)、曼迪(Mandy)、马克(Mark)与安妮(Annie)、阿莫斯(Amos)、艾斯特(Esther)、奥伯特(Obert)等家人。我还要向塞缪尔(Samuel)与另一位艾斯特(Esther)致以深深的谢意,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最后,因为太多的原因,我对温迪·埃斯普兰德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综观全书,我一直用指代男性的“他”作为人称代词,原因在于书中我所提及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男性。现代英格兰在一开始是一个父系社会,因此当时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多为男性。第七章的部分内容经挪威奥斯陆斯堪的纳维亚大学出版社许可,摘录自布鲁斯·G. 卡拉瑟斯的《经纪人与政治人:18世纪早期伦敦股票市场上的非经济理性》(*Acta Sociologica*, 1994, vol. 37, pp. 165—194)。

目 录

总序/1

致谢/1

第一章 引言/1

第二章 1672 年至 1712 年的英国政治/27

第三章 金融与国家形成/57

第四章 比较视角下的英国/99

第五章 金融产权与国家/126

第六章 政治与股份公司/151

第七章 伦敦股票市场上的交易/179

第八章 政府债券与政治关联/220

附录/234

参考文献/238

第一章 引言

然而，欧迈尼斯(Eumenes)感觉到，尽管他们相互鄙夷，但都惧怕自己，一直伺机杀害自己。于是，欧迈尼斯假装急需用钱，向最痛恨自己的人借钱。如此一来，欧迈尼斯聚集了一批人才，为了收回欠款，这些人只能够相信他，搁置谋害他的计划。结果，他人的财富成了欧迈尼斯的保镖。人们通常靠散财保性命，而欧迈尼斯却是收钱谋平安。

——普鲁塔克(Plutarch)

英格兰银行不仅是一家普通的银行，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亚当·斯密(Adam Smith)

卡迪西亚人欧迈尼斯曾任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首席秘书，也是其麾下一员将领。作为马其顿军队中的一名希腊将领，欧迈尼斯饱受军队中人的质疑与轻视。尽管他的部下不得不佩服他的治军才能，但这也让军中马其顿人对他的畏惧与敌对情绪愈演愈烈。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欧迈尼斯失去了坚强后盾，处境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诚如普鲁塔克所言，欧迈尼斯对此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扣押策略。他尽其所能大笔借钱，尤其瞄准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对手。作为债权人，欧迈尼斯的敌人靠欧迈尼斯的偿债能力获取经济利益，倘若

欧迈尼斯遇难，借款便血本无归。作为债务人，欧迈尼斯将债权人变成了不太情愿的盟友。实际上，欧迈尼斯对债权人实施了金钱绑架。

欧迈尼斯的故事揭示了有关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的一个重要事实。债务人起初仰赖债权人借款，但款项一经借出，债权人便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债务人。债权人的利益自此之后与债务人息息相关，因为债权人可能会面临债务人无力偿债的风险。由此可见，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借贷就已成为结交朋友与影响他人的一种方式。

很多情况下，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采用了欧迈尼斯的策略。在本书中，我将重点着墨于一类债务人，他们利用欧迈尼斯的主意，凭借债权人对其政治存亡的关注，创造出一个坚强的财务后盾。君主、统治者、国家以及政府这样的主权债务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从债权人那里获得了巨额资金。我们很自然会认为借贷是为了筹措活动资金。然而，借贷并不只是出于筹款需要，也是为了缔结盟友，尤其在涉及主权债务人的情况下，放贷行为无可避免地呈现出政治复杂性。为了经济利益，主权债权人势必会关心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因而，他们也必然会关注债务人政权的生死存亡。双方因此结为盟友。

现在，假设欧迈尼斯颇具金融头脑，他通过签发可转让本票向敌视他的债权人借款。由于本票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而债权人可以转让金融债权，或者凭意愿购入更多的债权。在市场上，欧迈尼斯的票据本可以被视作与其他可流通证券类似的金融商品，然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显然有可能影响票据交易。一些人可能会投资欧迈尼斯的票据以表支持，其他人可能会出售票据以示憎恶。事实上，欧迈尼斯的债务并非可转让商品，但主权债务通常可以转让。一旦主权债务成为可供交易人买卖的商品，那么主权债务人与主权债权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就转入了另一个层次。政治立场上的支持与反对可以影响主权债务的交易与债权人的变更。政治进而成为影响市场的因素。

如果说在政治上寻求的是权力，那么在市场上追逐的则是利润。有人认为，市场上的主权债务交易人大多是不问政治的利润最大化者。的确，许多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也极力主张这一简单假设。无论观点上的分歧有多大，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都一致同意，追逐利润是市场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此推论，交易人并不希望买卖受到政治干预，主权债务关系中的政治要素对市场的影响会变得无足轻重。当然，将政治排除出市场被认为是市

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亚当·斯密认为,人生而自利,“审慎的人”:“……不愿卷入任何政党纠纷,对派系斗争也深恶痛绝。”(Smith, 1976 [1790]: 353)^[1]市场与政治不相关这一固有本质如今仍为亚当·斯密的信徒所推崇:“没有哪个买面包的人会知道,面包原材料小麦的种植者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共和党,是立宪派还是法西斯分子,是黑人还是白人。这说明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是如何将经济活动与政治观点截然分开的……”(Friedman, 1962: 21)^[2]此外,经济市场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一个过程,在此期间,经济市场受非经济关系与非经济制度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论点加以发挥,我们可以推断,较之欠发达市场,发达市场受政治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更小,与政治脱钩标志着市场的“成熟”。

在现代英国早期,主权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既展示了欧迈尼斯的真实处境,也体现了我们虚构出的情形。17世纪末,国债迅猛增长,主权债权人数量大幅上升。“光荣革命”后建立起的政权通过大肆举债结交了诸多盟友。与此同时,政府债务成为流动性极强的金融商品,很容易在活跃的伦敦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易。与欧迈尼斯的债权人不同,主权债权人可以通过交易股份公司的股票来买卖他们的政府债务。

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分户账上记录了1712年大量的股票交易活动,按时间顺序记载了商人们以物易物与进行货币交易的倾向。大名鼎鼎的商人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绰号“秃鹫”,交易次数达21次,交易额总计13 300英镑。伦敦金匠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in)更为繁忙,交易次数多达128次,股票交易金额逾10万英镑。他们买卖股票的市场位于伦敦市中心伦巴第街附近的“交易巷”。当时的许多报纸都会公布每日股价,股票行情不难获取,而且标准化的股权转让合同也有了通用模板。股票交易司空见惯,业已成为一项“常规业务”。由于股票交易涉及金额巨大,因而人们不可能思虑不周、轻率决策。即使对冷静持重的人而言,买卖股票也是一门严肃的生意。但由此推断出股票市场是一个纯粹简单的市场尚为时过早,因为在商业的纷繁之下还涌动着政治的湍流。

[1] 另见米诺维兹(Minowitz, 1993: 80)。

[2] 更多关于自由市场遏制歧视行为的观点,参见汉普歇尔-蒙克(Hampsher-Monk, 1991)与桑斯坦(Sunstein, 1991)。

与多数同行一样,约翰·霍普金斯与托马斯·马丁也忠诚于某一党派,他们的许多交易都带有政治倾向性。在1710年与1713年的伦敦议会选举中,托马斯·马丁均投出相同的一票以示对辉格党的强力支持。虽然在其进行的128次交易中,有67次的交易对象政治立场不明,但在其余的61次交易中,与托利党进行的交易有15次,另外46次的交易对象为辉格党。这一比例大致反映出了股东中托利党与辉格党的占比,由此看来,马丁似乎并不太在意其交易伙伴的政治立场。“秃鹫”霍普金斯是一名辉格党议员,在其进行的21次交易中,仅有1次的交易对象为托利党,与辉格党进行的交易达7次,其余13次的交易对象政治立场不明。尽管霍普金斯一向以其敏锐的商业洞察力著称,但他在交易时似乎更青睐本党派的支持者。

与欧迈尼斯的对手一样,霍普金斯与马丁都是(间接的)主权债权人。东印度公司与远东地区开展贸易,也为英国政府提供巨额贷款。作为股东,霍普金斯与马丁实际上将钱借给了主权债权人,不过很难得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交易。或许是出于个人政治倾向,或许是形势因素促使其与某一党派的支持者进行更多交易,又或许交易伙伴的党派立场与交易活动并无关联。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当时指出,英国皇家交易所能够摆脱社会与国家差异,将本无交集可言的截然不同的人群聚到一起。^[1]这表明党派对市场而言无关紧要。

人们很自然会认为交易股票是为了赚钱,有利可图是主要目的。但这能对约翰·霍普金斯明显的政党偏见,或是对托马斯·马丁相对无所谓的态度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釋吗?更笼统地说,这一经济理性的假设可以解释早期现代伦敦股票市场的行为方式吗?在此,我打算将这些假设先搁置一旁,重新考虑一下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市场上追求政治目标呢?市场上的种种政治行为是否意味着市场欠缺效率,有失理性,尚未成熟?弗里德曼的论点表明,即便是试图通过经济行为实现政治目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竞争激烈的市场自然会惩治这种尝试。18世纪的记者与评论家理查德·斯梯尔(Rich-

[1] “能与这几位商务部部长交往,我感到无比高兴,行为与语言上的差异将他们区别开来:我有时置身于一伙美国人中,有时迷失在一帮犹太人里,有时又成为荷兰人群体中的一员。”(Ross, 1982:437)伏尔泰(Voltaire)也对伦敦市场呈现出的社会多样性与宗教多样性发表过评论(Voltaire, 1926[1733]:34)。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以“市场对所有人开放”的言论总结了市场的社会开放程度(Walzer, 1983:10)。

ard Steele)认为,交易人很清楚不应该因患得患失而分散精力,因为“……盈利是交易人的主要目的,这些人别无他求”(Ross, 1982:447)。〔1〕市场怎么可能成为适宜谋求政治目标的场所呢?

本书将会探讨政治与政治冲突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身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支持弗里德曼的推断,认为市场与政治界限明确,在各自范畴内都有特定的行事方式:人们在政治上游说选举,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在政治上各抒己见,在市场上自由进退。〔2〕更进一步说,将市场与政治分离极为必要,如果将两者混为一谈,就会引发理智甚至是道德上的麻烦。买卖政治影响力是一种腐败,由政治干预市场不说是有违理性,也被认为效率低下。〔3〕我们很容易设想市场与政治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人们也许每年都会投票支持同一政党,但在做生意时,人们不会在意政治忠诚,而是对所有的买卖对象都一视同仁。人们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经济与政治角色,视具体情况在两者之间切换身份。

当前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上的交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近年来,在社会学领域,理性选择的研究视角得到了更多关注,而这一视角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所在。〔4〕同样,经济学家对一些之前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如婚姻、犯罪、歧视)也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为社会制度提供了理性选择角度的解释。〔5〕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适用于“……一切人类行为”(Becker, 1976:8)的观点证明了这一趋势。所述种种留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学原理可以用于社会学研究,而反之则不然。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现代市场是一个自治体系,具有其内在的经济学逻辑。〔6〕不过,我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 1992, 1993)、泽利泽(Zelizer, 1989, 1994)、斯梅尔塞和斯维德伯格(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斯廷奇库伯(Stinchcombe, 1983)等人的看法一致,相信社会学家也可以为经济现象提供重要的社会学见解。

〔1〕约西亚·柴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也谈道:“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店主也是唯利是图的。”(Child, 1740:116)

〔2〕参见赫尔斯曼(Hirschman, 1970)。

〔3〕这一观点被一些人用来解释为什么当今第三世界的经济难以发展:国家与政府腐败不堪,政治对市场干预过多。可参见桑德布鲁克(Sandbrook, 1986)。

〔4〕典型事例可参见科尔曼(Coleman, 1990),也可参见赫克托(Hechter, 1987)。

〔5〕参见贝克尔(Becker, 1968, 1971, 1981)、布伦纳(Brenner, 1980)、肖特(Schotter, 1981)、库特与尤伦(Cooter and Ulen, 1988)、唐斯(Downs, 1957)、琼斯(Jones, 1984)及沃尔夫(Wolfe, 1989: 32, 35)。

〔6〕参见巴伦与哈南(Baron and Hannan, 1994)。

为论证这一点,我会将重点放在股票市场这一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制度上,探讨政治关系会如何影响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活力。我们必须放眼外部的政党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股票市场上发生的现象。伦敦证券交易所很适合作为个案,从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加以分析。^{〔1〕}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一个资本市场,伦敦股票市场为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实证依据。在资本市场,经济学分析方法适用于任何地方。

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人大多数认为,政治行为常常服务于经济利益,或者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比如,人们总是“为自己的钱袋投票”,支持某一候选人或某一政党是因为相信其执政后自己可以有更高的收入、纳更少的税。再比如,人们会向政府施压,要求通过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法案,正如一些产业要求政府抬高关税以保护其免遭海外竞争。这些政治活动都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左右。同样,这也可以用来解读阶级斗争中紧张的政治局势,其根源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经济利益矛盾。

然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确切地说,经济利益影响政治行为,这只能说对了一半。当人们在市场上追求政治目标时,政治利益会影响经济行为。^{〔2〕}人们对政治的考量影响了自己的买卖决策。然而,这其中看似合乎逻辑却有悖实际之处在于,经济竞争会迫使市场参与者密切留意底线。在激烈的经济交战中,政治是多数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因为有政治倾向的人很可能被他人压低价格。^{〔3〕}耽于政治的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难逃竞争性市场的惩罚。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但我仍在本书中考虑了一种经济受政治影响的情形。通过了解政治冲突影响经济行为的方式与原因,我认为像竞争这样的市场力量可以有效地将政治排除在市场之外。^{〔4〕}

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不止取决于特殊的偏好。无可否认,英国人对于政治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这在股票市场上非常不恰当地表现出来。强大的制度关联性将股票市场与英国政府以及争夺控制权的两党结合到了一起。这些基本的关联

〔1〕 尼尔(Neal, 1990)相信从金融经济学角度检验这些理论极为有用。

〔2〕 参见迪马吉奥(DiMaggio, 1990)。

〔3〕 弗里德曼认为,与生产力、效率或盈利能力无关的标准被竞争力排除在市场之外:“商人或企业家如果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与生产效率无关的偏好,那么与其他不这样做的人相比,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Friedman, 1962: 109)从长远来看,那些一直密切关注底线的人会比那些执着于非经济偏好的人更具竞争力。另见阿尔钦(Alchian, 1950)。

〔4〕 参见桑斯坦(1991)。

性推动了国家与市场的携手发展。1672年,伦敦还没有股票市场,英格兰还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国家,只有二流的军事实力。到1712年,仅过去了40年,伦敦就出现了高度组织化的资本市场,许多股份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活跃。此外,英国还成为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成功遏制了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扩张企图。英国经济形势的巨变与政治军事局势的巨变紧密相关,正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使得英格兰银行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英国激烈的政党冲突将政治与经济联系到了一起。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斗争激烈,紧张的两党关系成为政治生活不可否认的一大特征。当然,仅仅有政治竞争并不意味着会对市场行为产生影响。事实上,当时也有很多反对声。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一种论调是,头脑冷静的经济自利性有助于抑制对政治等的激情。^{〔1〕}商业会影响政治,反之则不然。相比之下,我认为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冲突对伦敦股票市场起到了意料之外的微妙影响。在阐述影响的原因与方式时,我会着重探讨制度上的关联,这些联系将国家、公债以及各大股份公司结合到一起,之后控制了股份公司,最终影响了股票市场上的交易。由此可以弄清楚,这些联系是如何将政治冲突“传导”到理性市场的。

本书也会谈及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社会精英是如何参与国家事务的。金融实力是故事的核心部分。^{〔2〕}随着国家调动经济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家实力也得到提升。国家通过征税与借贷两种方式获取资金用于打仗与控制疆域:税收与贷款为官僚体制及军事装备买单。然而,公共财政体制并非只是为了获取资金,它还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熊彼特指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层次、社会结构以及政策方针可能酝酿出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乃至更多方面都书写在这个民族的财政史上。”(Schumpeter, 1991: 101)在现代英格兰的早期,精神与文化的重要性不及社会结构与政策方针。

多数历史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都认为,现代早期的建国者通过“政治”制度与精英结为同盟。例如,英国的地主精英利用议会与地方政府一起参与国家治理。在其他国家,精英进入国家办事机构,或是通过地方议会或其他代表机构参与政府工作。随着国家的不断扩张,国家以各种方式将现代早期的精英纳入国

〔1〕 更多关于早期现代背景下的这一观点,参见赫尔斯曼(1977)。

〔2〕 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税制是一个组织,其发展促进了其他机构的发展。”(Schumpeter, 1991: 108)

家体制。^{〔1〕}在此,我想提出的是,精英有时候也会通过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这种不太明显的“政治”方式与国家及政权关联到一起。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尤其是战时),国家与政权需要贷款,于是与债权人建立了财务关系。债权人依靠欠债国家、政府或是政权的长久发展获取既得经济利益。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1993)将这种公共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恰如其分地称为“政治建构的产权”。

债务人与债权人是“契约”关系,双方自愿进行交易,债权人借款给债务人,以期在未来获得收益。这不同于同时交易(或“现期交易”),交易双方在买卖成交后钱货两清。债务人即刻获得贷款,而债权人之后才能拿到还款,这就给债权人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债权人希望债务人的还款承诺是切实可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债权人更喜欢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债务合同。其次,债权人还关注债务人的还款能力,以及债务人的生存现状。债权人不希望债务人在还没还清债务前就一命呜呼,因而,债权人很在意债务人的健康、财务及其他状况。将债务人绑在债权人身上的义务,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也将债权人绑在了债务人身上。这可能会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力量均衡,不再只是债务人单方面地受制于债权人。

现在设想一种情况,债务人正好是主权统治者或是主权政府。与之前一样,统治者从债权人那里获得了一次性付清的贷款,并承诺在一段时期内,偿还一系列款项。然而,统治者承诺的可信度通常受到质疑,因为可以约束普通债务人的法律通常不适用于主权债务人。^{〔2〕}此外,主权债权人也会关注主权债务人政权的稳定性,因为对方政权一旦倒台,自己就会成为最大的输家。通过革命上台的新政权极少会承担被推翻政权的金融债务。^{〔3〕}从某种意义上说,债权人在政治上受到债务人政权的制约,正如债务人政权在财政上受制于债权人一样。

债权人必然是那些有钱可以借的人。国内主权债权人来自英国社会的经济精英,但是英国的精英群体既不团结也不庞大。在18世纪早期,这一群体主要

〔1〕 笼络精英可能是把双刃剑,参见塞尔兹尼克(Selznick, 1949)的著名分析。

〔2〕 参见维奇(Veitch, 1986)与巴泽尔(Barzel, 1992)。

〔3〕 我们可以1919年后变得一文不值的俄罗斯帝国债券或美国南北战争后的联盟债券为例。共产主义政权不会承担俄国帝制时期欠下的债务,获胜的联邦政府也拒绝偿还联盟债权人的款项。当然,并非所有的政治革命都会引发拒付债务的事件,如果新政权也打算向之前的债权人借钱,这种情况就更不会出现。